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对外关系卷

吴建雍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OREIGN RELATIONS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对外关系卷

吴建雍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OREIGN RELATION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戴逸主编;吴建雍著. — 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8.12

ISBN 7-80638-386-7

I. 18… II. ①戴… ②吴… III. ①国际关系史-18 世纪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8 世纪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68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海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9 千字 印张:11% 插页:5

印数:1—2 000 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责任校对:赵学良

封面设计:杜凤宝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8.60 元

结 言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对外关系卷

本卷系《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对外关系卷。如果说，其他各卷是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诸方面进行比较，本卷则是直接论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清前期社会的影响。

笔者不想把本卷写成面面俱到的清前期对外关系史，只准备截取那些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像，进行揭示和论述，以期抓住主要的历史线索，避免不必要的枝蔓。

18 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固然包括清朝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依然是古代的天朝上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无论朝贡回赐、祝釐赏赉，还是敕使颁诏、使行晋谒，都是对传统关系的维系，故不想在这方面再费笔墨。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使亚洲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本卷主要阐述清朝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原因。

18 世纪的中西关系，既有文化交流，也有使节来华。前者，已包容在文化卷中，故无庸赘述。后者，次数有限，且与贡使无异。除马戛尔尼使团外，并未产生深远影响。与

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却是持续不断的，对双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乃至最终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本卷何以在中西关系中，又以通商关系为主的因由所在。

马克思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作了最精辟的概括，他讲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①

18世纪是“商业战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在世界的西半球，欧洲殖民势力通过黑奴贩运，对当地的财富进行着赤裸裸的掠夺。在世界的东半球，除了血与火的征服外，西方国家遇到了一个曾高度发达的具有古老而辉煌文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由于博大文化的泽霈，以及当时并不弱于西方的国力，清王朝使得惯于诉诸武力的殖民势力，不但奈何它不得，反而为其独步于世界的手工业品和茶叶所倾倒。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贸易史上的“茶叶世纪”。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就是在这种力量均衡的制约下进行的。

然而，一个世纪后，刚刚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随着茶叶贸易的直线上升，国势却日渐衰落。它已经被拖到了鸦片战争的边缘，竟然还不知晓。这魔术般的变化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是在“商业战争”中悄然完成的。19世纪30年代末，当西方的炮舰重新出现在虎门洋面上时，曾使侵略者折戟沉沙的清朝守军，却未能捍卫住国门。历史的反思，不能不从这场商业战争开始。

本卷以考察中西通商亦即“商业战争”中的中西关系为主，是由18世纪世界历史的背景所决定的。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两个世纪，被史学家称做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或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人称之为重商时代或重商主义时代^①。18世纪上半叶已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后期，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顶峰时代。英国最早经由重商主义之路进入工业革命。作为重商主义产物的东印度公司，同样是在18世纪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而且，无不以对华贸易为主。这充分说明了，欧洲对中国的贸易，在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中的重要作用。因而，18世纪的中外关系是脱离不开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扩张的大背景的。中西不同的历史进程并非是孤立发展的，恰恰是在互动中完成的。

清代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18世纪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与其说是方法问题，不如说是研究客体本身的要求。只有从18世纪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清代的历史，才能拓深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特别是本卷，名为对外关系，更离不开对关系双方的考察。笔者从通商入手，对中西不同的社会背景、对外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关进、出口商品的分别论述，旨在以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线索，说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阐述不同国度手工业、商业、金融业、航运业的发展水平，进而揭

① 《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365页。

示通商关系内含的文化关系、政治关系。事实上，以商品为纽带的中外联系，不仅展示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样展示了清朝与那些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亚洲国家的关系。显然，在这样广阔的世界联系中，对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考察，都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为，看似微观的现象，往往折射出宏观的景象。例如，在考察清前期中国生丝出口量的变化时，如果仅研究清政府对生丝出口的政策就很不够。如果，将清代生丝出口的变化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其他生丝主要产地的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展现出一幅更加丰满、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景象。你会看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出口数量的明显增加，除了与清政府的政策有关，还与英国降低了进口华丝的税率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促使英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又在于意大利停止了向英国供应生丝。显然，不进行这样深入的多方面的考察，就无法准确地判断清代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难评估清政府有关政策的得失。

自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中西的直接联系，记载中国的外文文献日渐丰富，为中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弥补了中文史料的不足。特别是在中外通商史方面，清前期有关贸易的中文统计资料极其缺乏。可是，东印度公司遗留下来的大量档案，却保存着很多详实的记载。充分利用这些史料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对18世纪中外关系的研究十分重要，就是对清史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笔者在撰写此卷的过程中，力图充分地挖掘利用这些外文史料，并介绍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目 录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对外关系卷

绪 言	(1)
第一章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与行商制度	(1)
第一节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	(1)
一 17、18 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1)
二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及其性质	(5)
三 清前期对外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1)
第二节 清前期的榷关制度	(16)
第三节 广东十三行	(25)
一 早期的十三行	(25)
二 行商制度	(35)
三 十三行与西方资本的关系	(48)
四 行商与鸦片走私的关系	(63)
第二章 清朝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通商	(69)
第一节 清朝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69)
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	(69)
二 1757 年前的中英贸易	(77)

三	广州通商与港脚贸易	(87)
四	鸦片走私与中英正常贸易的终结	(99)
第二节	清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113)
一	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	(113)
二	中国与荷兰的直接通商	(123)
三	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三角贸易	(130)
四	华侨与巴达维亚	(138)
第三节	清朝与法国、瑞典、丹麦 东印度公司	(153)
一	清朝与法国东印度公司	(153)
二	清朝与瑞典东印度公司	(161)
三	清朝与丹麦东印度公司	(182)
第四节	清朝与俄国的陆路通商	(188)
一	北京中俄贸易	(188)
二	恰克图中俄贸易	(192)
第三章	清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204)
第一节	茶叶	(204)
一	茶叶贸易的开始与发展	(205)
二	茶叶出口的高潮	(213)
三	外销茶叶经济	(221)
第二节	生丝	(233)
一	历史回顾	(233)
二	中国生丝出口与亚洲生丝市场	(236)
三	中国生丝出口的不断增多	(244)
四	生丝出口与丝产地经济	(249)
第三节	纺织品	(254)

一 丝绸	(256)
二 南京布	(268)
第四节 瓷器	(276)
一 中国瓷器输入欧洲	(276)
二 18 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	(281)
三 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296)
 第四章 清代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和白银	(304)
第一节 白银	(304)
第二节 毛织品	(317)
第三节 棉花	(326)
 第五章 鸦片走私	(342)
 参考书目	(360)

第一章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对外关系卷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 与行商制度

第一节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

一 17、18 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明末经历着很大的变化，即由用制钱或手工业品赴东、西洋交换那里所产的香料、苏木和珠宝、珍禽奇兽等，转变为主要以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加工品交换白银等。这种转变，与欧洲、美洲、亚洲相互之间海路的开辟及其随后西方人的东来有很大关系。当时，他们到亚洲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东方的财富，特别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令西方倾倒的“奢侈品”。为取得这些货物，他们将很大一部分美洲白银运往东南亚，在那里与中国商人贸易。这些白银流向东亚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西班牙帆船

从墨西哥西部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出发，横越太平洋，将美洲白银运到吕宋群岛，在那里与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等省的商人交换货物；一是由西班牙金银舰队载银从墨西哥和巴拿马地峡运到塞维利亚（西班牙城市），再流入里斯本，由葡萄牙人绕好望角，经果阿、马六甲、最后运到澳门，用来为日本、印度、中东以及西欧的市场购买中国货；一是上述运至塞维利亚的一部分白银流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由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再运至东南亚，用来交换中国商品。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其中仅通过第一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就达5~8万公斤，1597年时，曾高达34万多公斤，这些白银已超过明代国内白银的年产量^①。

这种海外贸易结构，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闽粤地区“望海谋生者十之五六”。在明、清之际的文献中，不乏这样的记载：“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尝其值。”^②可见，进口白银已有一部分成为“百工之肆”的生产资金。由于出口商品增多，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必然会分化出一些专门面向海外市场的行业。这类行业中，以外销瓷制品最为典型。在目前欧洲珍藏的华瓷中，有一件绘有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纹章的青花瓷壶，要算是年代最早的定做外销瓷了。有关这类特制外销瓷批量生产的最早记载，见于荷兰东印度公司1639年的档案。它

① 阿特韦尔：《国际白银流动与中国经济》。

② 《广东新语》。

在那一年，定做了25 000件荷兰样式的中国瓷器^①。据不完全统计，在1602年到1682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华瓷就有1 600万件以上^②。尽管其他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商品数量有多大，尚不得而知。但外销瓷的定做方式，足以说明中国出口商品已由原来的一般生产剩余品转变为一定程度的定向定量生产的外销品。这一变化在中外贸易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透露了外向型经济产生的信息。

明、清之际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清初出现了有关海外贸易的理论。例如，康熙年间，慕天颜提出的“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富强可以坐致”的奏议；雍正初年，蓝鼎元提出的“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的主张，都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他们进一步阐明“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生财之大道在百工”的道理，表达了贸易可以刺激手工业发展的思想^③。这些理论与欧洲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的产生正反映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的事实。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中西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欧、美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激增。当时，由中国向欧洲出口的大宗商品为茶叶、生丝、南京土布、瓷器等。如果说17世纪时，这些中国货在欧洲还被视为“奢侈品”，只有王室贵族、上流社会才能享用；那么，自18世纪以来，由于进口数量增多，它们几乎已被西欧全社会所接受，成为普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例如，茶

① 《中国外销瓷》，第8页。

②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82页。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鹿洲初集》，卷三。

叶被称为“开始了欧洲贸易史的新篇章”^①，是深受西方欢迎的大众饮料。仅从输往英国的数量看，18世纪50年代，每年的输入量为2万担左右，到60年代增加为4万多担。80年代增至13万余担，18世纪末便达到22万余担，也就是说50年中增加了10倍^②。再如中国瓷器，由于较当时欧洲通用的锡镴等金属及木质、陶质餐具，既轻便、卫生、易洗涤，且价格便宜，因而，逐渐取代了西方传统餐具，进入普通人家的厨房；加之，饮茶风尚的形成，更促进了瓷质茶具的大量进口。其时，以向欧洲市场运销华瓷著称的荷兰、英国等国家，无论大、小城市，都有销售中国瓷器的商人，他们不仅库存现货，还备有供顾客选择的样品，承揽定购特制瓷器的业务^③。直到18世纪后期，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引进中国制瓷工艺，生产出硬瓷，华瓷的流入才逐渐减少。可是自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首抵广州后，中美贸易的建立和发展，又为中国瓷器提供了美洲市场，外销瓷的出口依然十分兴旺^④。

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半叶，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在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几乎9/10是银货^⑤。

由此可见，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西贸易结构依然使中国处于顺差地位。而且，由于中西定期贸易的建立和中国商品成为世界性供求关系中的必需品，提供这些商品的中国外向型经济有了长足进展。不但外销瓷出口的激增，使广

① 《欧洲经济史》，第5卷。

② ⑤ 参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③ 《中国外销瓷》，第19页。

④ 《销美中国瓷器》。

州出现了专门加工“洋彩”（外销瓷）的手工业。而且，原来可能是一般剩余产品的茶叶，也因欧洲人的偏爱，而形成销往西方的几种主要品种。其中，绿茶以熙春、松萝、屯溪为主，红茶以武夷、工夫为主。由于茶叶也采取提前一年订货的办法，外销茶叶生产的专业化也逐渐形成。

18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贸易，尽管遭到盘踞在那里的西方殖民者的破坏乃至血腥摧残，又受到本国封建统治者阻遏，可是，仍在顽强、艰难地发展着。特别是从暹罗等国进口米粮的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17、18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定期的跨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既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走向世界的机遇。

二 清前期的对外政策及其性质

在讨论历史上对外政策是“开放”还是“闭关锁国”时，必须从当时的历史事实出发，分清何者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何者为国家政策作用的结果。前者是判断政策的标准，后者是依据，二者不容混淆。

明、清之际，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外贸易的扩大，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向。根本无法设想，当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世界经济联系之中后，会有一种力量能将其重新封闭起来。清初“禁海”政策的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顺、康之交，以“海氛未靖”为由，清政府令“滨海民悉涉内地五十里”，片帆不准下海^①。可是，海外贸易并

^① 《广东新语》，卷二，地语，第30页。

未因迁海而停止，只不过或为郑氏抗清力量所控制，或被地方藩商所垄断。清朝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布了“开海贸易”的谕旨，又不过是对海外贸易既成事实的认可，并将其置于封建政府的管理之下。因而，与其说这个谕旨表现了清政府的“开放政策”，不如说是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有清一代，这种要求开放的动力始终潜生暗长着，并作为制约清王朝封闭政策的主要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严禁南洋贸易，但奉行10年后，又不得不在雍正五年（1727年）取消这个禁令。乾隆初年，闽、粤地区与南洋的经济联系更是发展到禁之不可的地步。据闽籍侍郎蔡新所言：“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必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者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南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人，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① 同样反映了这种不可阻遏的经济力量。

显然，我们在判断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性质时，不可忽视中国在17—18世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不能忘记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存在。更不能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出口能力的增强，视为所谓清政府的“开放”政策的结果。事实上，清前期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说是“闭关锁国”的。这里的“闭关锁国”是指与“开放经济”相对的“自给经济”政策，应属政治经济范畴，而非

^① 光绪重刻《漳州府志》，卷三三，人物六。

指具体的表面海关的“开”与“闭”。否则，就会产生“凡是没有实行禁海的国家，便都是实行开放政策”的错误推理。

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首先表现在对航海业的自我摧残和对海外贸易的阻遏羁勒。

从明、清之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扩大的情况看，迅速发展当时并不低于西方的航海能力，增加出海贸易，是中国经济能否适应历史趋势的关键。恰恰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上，清王朝背道而驰，较之明朝对出海贸易的限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它对出海商船载重量（必须在500石以下）、桅杆数（只许用双桅）、梁头高度（不得超过1.8丈）乃至携带食粮、武器数量等都有苛刻限制^①。在这样的限制下，中国商船连防卫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远洋航行。当时，西方海盗直言不讳地声称“一只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无困难地”抢劫中国船^②。清政府对出海贸易的限制，还殃及国内的海运。例如，它以“粤东各属在在皆濒临海口，恐易偷漏”为由，规定“凡浙省湖丝贩运来粤”，必由陆路经南、韶二府，“抵省城及佛山等处销售”^③。嘉庆年间，原本由陆路运输的安徽松萝茶等，渐改海运。清政府又以“海运难保奸商串通黠夷”为由，重申“仍旧内河过山贩运，以收控驭之益”^④。结果，清代民间海运日趋凋敝。以鹿港为例，清初商船数百，至道光初年“止五十余号”船。商无不抱怨：因时常禁港，贩运失利；又因被迫配运官谷，倾尽家

①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二〇，第1~2頁，卷六二九，第1頁。

② 田汝康：《十七—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業的發展》。

③ 清代關稅檔案，錄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明山奏。

④ 《粵海關志》，卷十八，第3頁。